

夏时制 6 年后为何被叫停

1986 年 5 月 4 日,中国开始实行夏时制:夏天,把时针向前拨快 1 小时,冬天向后拨慢 1 小时。但科学理性偏遭遇了传统习俗。夏时制固然可以节约能源,但却不符合国人的生活习惯,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初提夏时制

1983 年春节前,北京市科协所属的北京能源学会,召开了以“能源与环境”为主题的年会。

从改革开放之初,学会常务理事、时任清华大学实验电厂总工程师谢行健就注意到了节能的问题。他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夏时制,甚至中国在解放前也短暂实行过三年,节能效果非常明显。

他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实施夏时制 6 个月,可节约 21.3 亿度电,按照当年照明电价每度 0.14 元来计算的话,可节约人民币 3 亿元左右。这些节约的电量如果全部用于工业生产,工业产值将提高 50 亿元以上。

这几个数字立刻吸引了年会上的学者们。大家一致认为,应进一步调查研究,并向国家提出建议。

调研和建言

1983 年 3 月份开始,谢行健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陆续写了几十封信,寄给国家相关部委和龙头企业。信中称,该学会建议实施夏时制,想征求各方意见。

一两个月后,几十封回信陆续寄到了学会。他至今保存着其中的 10 封——7 封基本持肯定意见;3 封持反对意见。

来自外交部、财政部、地震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的信件,表示完全赞同。外交部提出,西欧的国家早就开始实施了;财政部认为,这个想法可以作为将来经济改革的参考。

铁道部、广播电视部和民航部门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铁道部调查后认为,每年变更两次时间,意味着列车时刻表也将做两次大规模的改动,工作量很大,且会造成不便。

广播电视部担心,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表调整两次,会影响播出安全。

民航总局的北京管理局认为,如果变更为夏时制,日出和日落时间都需要进行换算,对于一些没有经验的机长会有影响;机场开灯时间也会受到影响。

蒋介石的糟糕口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之所以引发矛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蒋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别的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大约在 1943 年,军事委员会联络处一个姓侯的主任,被蒋介石召到办公室一阵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神来时,便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到底是这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原来,蒋介石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

《安徽日报》2013.5.10

袁世凯为称帝修厕所

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搬进了中南海,办公室设在居仁堂。在他下了称帝的决心之后,便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袁世凯一宣布称帝,立即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万般无奈之下,袁只得求助于迷信。其长子袁克定向他举荐了一位山东的风水先生贾兴连。很快,贾兴连被带进了袁世凯的办公室。贾兴连在紫禁城看了 3 天,认为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正位之后,难免出现一些波折,而破解的办法就是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1913 年 10 月,袁世凯就任中国民国大总统后与各国使节合影留念收秒气。袁世凯虽然觉得这样做不太雅观,但为了皇图永固,便接受了贾的建议。后来厕所是修好了,可举国反袁的声音却愈加高涨,他只做了 83 天的皇帝便呜呼哀哉了。

摘自《散落的历史》

胡耀邦表态支持

1985 年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看到了这份报告。

这位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老红军十分感兴趣。马宾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实行夏令时。

1986 年 4 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夏时制问题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第四次批示:“我是同意的,习惯不是什么困难。民航、铁路也会有办法解决。”

4 月 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谢行健列席这次会议。

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他直接切入主题,让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就夏时制一事作汇报。陈俊生简要介绍了夏时制在全球的实施情况,以及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听完后,胡耀邦首先表态:“凡是科学的,我都赞成。总理同意的,我也同意。”他还说,这是一个好事,可以快点开展。

大家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

5 月 4 日这一天是星期天,也是青年节。

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中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

9 月 14 日,是 9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夏时制的效果

各地实施夏时制的情况被反馈回来。好消息是,全国的运输系统没有因为夏时制的推行而发生重大事故。坏消息是,水电部的数据显示,当年西南的成都、昆明、南宁、柳州和西北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基本没有达到节电效果。这是因为,西部本来就跟北京时差较大,夏时制实行后,还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早上需要开灯。

其他问题包括,南方城市三班倒的早班职工反映,夏季天热睡得晚,早晨上班还要提前一个小时,影响休息。还有的地方,各单位自行其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作息不同,互相干扰。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86 年实行夏时制的 133 天,节约照明高峰用电 6.27 亿度。这一成果,虽低于最初的预期,但也很

可观了,且仍有增加的空间。

1989 年 2 月,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我国实行夏时制问题的研究》的结题报告称,实施夏时制以来,至 1989 年,中国已经节约用电共计 30 亿度。到 2000 年,预计经济效益将累计达到 534 至 713 亿元。

夏时制的叫停

夏时制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广东省代表每年上全国两会时,都会提出取消夏时制的提案和议案。“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也影响当地的经济。”徐寿波说。

而在学界内部,夏时制也引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1990 年,来自江西抚州师范学院的地理教师甘本根提出,夏时制是一种更适合中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效果并不明显的时间制度。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大多集中在低纬度的南方;中高纬度地区面积虽大,但多为草原、荒漠和农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管什么夏时制,就算农民愿意实行夏时制,牲畜也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一意见在地理学会上引起了共鸣。

甘本根于 1991 年 9 月将发表后的发言稿以挂号信寄往国务院办公厅。

1992 年 3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

我国自 1986 年起实行夏时制以来,在一些地区收到了节约照明用电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又统一执行北京时间,因此,实行夏时制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而且,实行夏时制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从 1992 起暂停实行夏时制。各地区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合理调整作息时间,以达到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照明用电的目的。

夏时制就此戛然而止。

实施夏时制的那 6 年,谢行健多次参加中央会议,最大的感受是,其实节能效果不错,各部门反响也不错。在如今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毕竟,实行夏时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中国新闻周刊》2013.8.16 文 / 徐天

四川“劳教”曾饿死两千孩子

1958 年,由于要在建国十周年搞献礼,上海打造“十无城市”,其中一项是“无流浪儿”。10 月 29 日,上海市儿童教养院 502 名儿童集体被迁到甘肃省张掖县,13 岁的陈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偷跑出来扒火车,想要回上海。车到成都查票时,他被赶下车,旋即被收容劳教。却不想,他又赶上了另一场运动:1957 年末,四川省公安机关对全省流浪在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苏联将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

时年 12 岁的重庆人陈桐均跟陈德全成了难友。陈桐均跟老师拌嘴被学校开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头。和他们在一起的孩子,被劳教的原因各不相同。12 岁的颜嘉森所在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写标语的是他,就把他劳教了。13 岁的杨泽云,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街道和派出所对他母亲说:给孩子一条生路,去劳教。那里有饭吃,又能读书。母亲就签了字,申请劳教。

从 1958 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 9 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

1959 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饥饿迅速教孩子们学会了辨认油菜、豌豆、胡豆等农作物,开荒变成了一场末日的晚餐。“小劳教”们把所有的种子都挖出来吃掉了,甚至包括用福尔马林泡过、粪水浇过的萝卜。而蟋蟀、蚯蚓都成了食物。幸存者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时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

死神慢慢找到了机会,向孩子们下手。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究竟死了多少孩子?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说: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 2600 多人。

《老人生活报》2013.8.21 文 / 冯翔

大连足球政商关系

2012 年 12 月 3 日,经大连市足协上报大连市体育局同意,大连阿尔滨足球俱乐部整体收购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一事已上报中国足协。

阿尔滨集团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民营建筑公司之一,老板是 43 岁的赵明阳,他还是新锐中超球队大连阿尔滨队的老板。

王健林:最早的掌门人

这支成立了近 20 年的球队,最早的掌门人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入主后第一场比赛,王拎着 20 万元现金随队征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万达队夺得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甲 A 冠军。

第一年投资足球,王健林本来只想花 400 万元,到最后严重超支,掏了 600 万元。这对于事业刚起步的万达集团来说“简直要了命”,但王健林咬牙继续投资足球。

然而,王健林在球队运营上的实际权力较小——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是著名的“足球市长”。1998 年赛季初,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事俱备,就差开发布会了。“这时,薄熙来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上有市领导强硬干预,下面还要面对足坛的“假赌黑”,在足球声望的顶点,王健林选择退出。1999 年 12 月 24 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徐明:“利益捆绑太深了”

如果不是一心要讨“足球市长”的欢心,徐明或许从来不会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

业界人士认为,徐明进入足球圈,与大连市有意打“足球名片”的背景有关。“徐明不懂球,也不看球。”徐的一位朋友说,“他只是把足球当成企业运转的棋子。”

接管俱乐部的最初三年,大连实德队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顶级赛事的冠军。

“以前主场比赛经常有副书记、副市长赛前看望球队,徐明就拼命把成绩做上去。但后来领导不重视足球了,连体育局长都不去看球了,徐明对足球的热情和投入也骤然降温。”一位内部人士称。

2005 年,大连实德队拿到第一个中超冠军——这是这支中国职业联赛最成功球队最后的辉煌。2006 年年初,大连实德队在亚洲 A3 联赛中排名垫底,从此开始滑坡。

一位曾经在实德俱乐部做过高管的人士透露:有一天,他到徐明办公室汇报工作,中间徐接到一个电话,这位高管听出电话那头是大连市某区的一位副区长。他听出,副区长是想通过徐明,和薄熙来及薄谷开来搭上线寻求晋升机会,而徐明满口答应。

不久,这位高管就辞职了,他预感徐明会出事,“和某些领导利益捆绑太深了”。

赵明阳:新“球迷老板”

赵明阳是一个狂热的大连队球迷。他经常半夜起来看欧洲五大联赛,亦经常去现场看球,对大连队很多球员的特点都很熟悉。

为大连足球寻找新东家,令大连市足协颇为头疼,最终的人主者是赵明阳。“因为他投资足球意志非常强,且搞足球的动机看上去更纯粹。”大连市足协一位领导如此评价赵明阳。

赵明阳买下实德俱乐部到底要花多少钱?一位实德集团清算小组的人士透露,赵明阳以承接实德集团所欠大连银行 3.3 亿元债务的方式收购了实德俱乐部。

《南方周末》文 / 张育群